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七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三期 ——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3d）

【史海钩沉】我所知道的谭甫仁被刺事件	周孜仁
【研究报告】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	印红标
【发微探幽】和“圣人”对话——毛泽东晚年文化心态的一个侧面	陈晋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我所知道的谭甫仁被刺事件

• 周孜仁 •

谭甫仁，广东仁化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委总政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二纵新编三旅政委，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五五年授中将军衔。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想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也想说明谭甫仁当属林彪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这样，一九六八年八月，待到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均已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也已就绪待建，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行事大刀阔斧，敢说敢干，颇富魄力。上任伊始，旋即以“划线站队”、“围海（滇池）造田”、修“万岁纪念馆”三板斧，在全省很快树立起毋庸置疑的巨大威望。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计划每年一届。一九

六九年开了第一届。第二届代表数号称上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笔者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笔者表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激动得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想喊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没喊出声来——我当然知道他想喊什么，只能对这位山民的朴素憨实报以一笑而已。仅此一端，足见其时谭在云南边疆的威望是足够高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个万人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毙。身上共中三弹：颈部、肩部和胸部各一。其中一弹从胸部心脏旁边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暗杀发生在凌晨四时五十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十二时许。谭一九一〇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他的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七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几十年后的现在，中国人对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算是见得多了，且不谈贪赃枉法者如成克杰、胡长清者流，即使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的被劫杀也并无大的轰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九三六年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则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就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断然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然从舷梯款款而出，吓得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干掉了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不是没有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的时候，笔者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曰王克学，任昆明军区党办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照看地方工作，为此，甫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在外间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军区调研组就被外间叫做：“谭办”。

“谭办”成立于1969年10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就自然解散。只是谭甫仁被杀前后，笔者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

#### ◇ 凶案的几个蹊跷之点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十一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谭很喜欢去专州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在外巡游，十三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当然由秘书事前拟好，十五日他去会上讲过，计划十八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十七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留下了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说到此，必须对谭的住宅多花些笔墨介绍。谭甫仁住解放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是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实际上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使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端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院中窄路，就是军区机关的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等等，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王自正。王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他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的枪械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所有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 ◇ 暗杀全过程追记

为了说清暗杀的全过程，必须对谭甫仁住宅的环境再做一些补充描述。

和32号后墙平行布置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地，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东西，并从32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于是就留下隐患——凶手王自正就正好由此墙爬了进去。他从食堂取来凳子，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绕大院而过的环城公路（现在叫西昌路）一入夜便阒无人迹，记得当时我们偶有急事晚归，骑单车经由密树森耸的环城公路，还常有厉鬼追魂的恐怖之感。王自正是凌晨四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由小院又非常方便地登上小楼，接近了谭甫仁的卧室。

这儿又得对别墅院的结构继续作些补充。别墅前门有警卫室一。原来住二人，现在只一人。然后是一片花园。接着就是小楼了。紧靠后墙是一排附属平房，有厨房、贮藏室，还有房间供警卫、保姆及其他人等居住。平房和小楼之间是斜长形的天井。凶手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谭甫仁卧室在二楼，他非常清楚，竟直去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王自正这样问道：“谭甫仁在什么地

方？”王回答的是：“不知道。”凶手急眼遍扫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王夫人射杀。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于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的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多绝对非常安静。这枪声绝对是惊天动地的。既已扳动了手枪，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枪下。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我的印象里她是单身一人。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也跟着跑起来。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当时谭甫仁如果坚守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一间屋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凶手只有六颗子弹，已经用了一颗，六姨如果能够参与搏斗，将凶手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可惜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戴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都睡了！前面说了，野营拉练拉走三个，现在只剩前门一个，后面一个。前门距离稍远些，他就趑进小天井，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奇怪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瞌睡太大？昆明有句俗话：“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可现在的问题是：明明枪声已经响了，明明命在旦夕的首长把门敲得山响，瞌睡再大也不会如此不省人事呀！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那么，事情是不是如此呢？五年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一九七五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璧来滇重新审理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说那一晚他正和褓姆睡觉呢。他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作奸犯科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警卫员正当年华，那褓姆呢，说是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跑了台湾，一个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烧饭浆洗度日，她的年龄应该不小，至少五十上下了。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其准确称谓应是“伪军官太太”，即使不加惩治，也需要从严控制的，可她偏偏却留在了“云南王”的身边，此事曾使我们十分不解。据笔者记忆，褓姆很爱整洁，成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白皮肤，五官十分端正，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她毕竟已隔日黄花，怎么会在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边演绎出这等鸟事？这也让人啼笑皆非。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现在轮到谭甫仁来陨命了。窄窄的小天井里，谭已经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这位猎物在二千三百万云南人心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政治斗争总是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闹剧。

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

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五十年代写过一本书，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还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要被浓缩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的三十二号院的小天井来，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这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对局。行猎者一共射出三颗子弹，一颗射中谭的颈部，一颗射中肩胛骨，最后一颗尤其准，正中谭甫仁胸膛，而且显然就从心脏处射入，谭立扑于地——王自正有充份理由认为谭已经死了，于是由原路扬长而去。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五十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经是六点过了。凶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次得手之后，他已经又非常从容地去军区政治部大院进行了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平静入睡。

王自正的住地位于离解放新村不远的西坝，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另一个院落。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两年前的八月，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等等，这些阶下罪囚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他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宗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暗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五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宗住房的具体位置，于是胡乱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糊糊起床来，他把王自正引去了陈的家门口。小孩认识陈，对王也很面熟，引路回来自个儿又囫圇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宗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去了。他夫人也不在昆明。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西坝了。一位正在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帮家伙已经被关押快两年，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就放任不管了。反正王自正把他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回到西坝，他非常满意地平静睡去。而大搜捕，开始在全昆明开始了。

## ◇ 我的印象

本段插入的是笔者个人当时的经历。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八号“谭办”安睡。离三十二号有相当距离的八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笔者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八号院的值班室高卧。需要补充的是，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不来上班，等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关门闭户。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看见食堂对面有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慢徊，在三十二号周围的草地上做地毯式的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满地白霜，草地上踏得乱糟糟全是脚印。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我是读过的。象这样搜寻案犯，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来有一点线索倒被这帮笨蛋破坏殆尽。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出街觅食，这才发现，一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大事了。回到八号，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感到惊讶：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三天。八号寂聊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精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半夜都会有军人惊吒吒冲进来，全副戎装，荷枪实弹，手臂上还扎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地要我将办公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像凶犯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里。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们的顶头上司甫汉独个儿躲在他的办公室里伤伤心心哭，我们就更无事好干了。按照布置，就让我们每人写交代，按小时为单位，说明那些天的所作所为，包括每一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一个人在办公室学毛著学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散步；几点，在阳台上拉二胡；几点泡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 ◇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六点，军区大院被封锁，接着，整个昆明市也被封锁了。空中交通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昆明全城更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几天之内抓人无数，笔者不知具体数据，不能在此妄言。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半月案件侦破却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光火了，狠批了昆明军区这帮无能之辈，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笔者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但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准确、一针见血的。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难脱干系，在谭被害后第八十二天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时分，用尼龙网兜悬在床头栏杆上自吊身亡。参与侦破工作的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也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接受调查。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一九六八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份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某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都是二野班底，林彪自是很不放心。派谭甫仁来滇主政，又调五十四军入滇，将南京军区的王必成调昆明军区作司令员，对昆明军区掺沙子进行成份改造……林

可谓煞费苦心了。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把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当时大会小会都要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景的自杀，应该说是深得其中的斗争奥妙和自己政治处境的的尴尬了，除了自杀，他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据说，还让目击者——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去军区各办公室指认。数日指认无果，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引路的那位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带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什么什么而不知其父亲为谁。七十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共用澡堂。马苏红和王自正的小孩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打闹。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很快查到了那位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奇怪：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吗？身被羁押，他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一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西坝。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去打扫清洁。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于是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派队，让马苏红从队首向队尾走一遍，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处长，他对笔者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恐慌，惊讶，可怕，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笔者就亲自看见许多兵士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保卫部有“五六式”手枪遗失，而“017案件”现场发现的就是该型手枪的子弹。后来听说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六式”手枪一支——王行凶后返回时把枪扔进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堆在那里——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深夜进行的。派了许多兵士在屋外实施包围，然后由两个保卫干事进门将王唤醒。内部传闻对抓捕过程叙述如下：

王问：“干什么？”

答：“请你跟我们出去一下。”

王问：“我可以穿皮鞋吗？”

答：“自便。”

王反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掏出另一只五六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

不知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七粒子弹，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用去四粒，还剩三粒。这时，他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便往门外直奔而去。但他已无路可逃了，门外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 关于凶案的余音

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 1 7 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一直存在，甚至谭甫仁将军的骨灰，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够进入本来顺理成章应该送去的地方：北京八宝山公墓。

谭甫仁遇刺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写进九大新党章的法定继承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一代雄杰过于夸张的政治表演从此落幕，炙手可热的“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困境。再让赵泽莽担任破案组长显然不合适了。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老昆明军区的人来担任了，赵的专案组的某些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象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当然必须用够。不言而喻，谁抓住了破案权，谁就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而案件破与不破，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专案组“翻翻烧饼”当然不足为怪——事情一直就拖到了一九七五年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才由公安部副部长赵苍璧前来云南重新审理此案，算是对“0 1 7 案件”做了最后了结，而谭的骨灰问题还是不了了之。谭的被刺，是那个特殊年代不可避免的悲剧；案件侦破过程本身，也折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和悲剧。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划个线，那么谭甫仁确应是林彪线上的人物了。据当时所知，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是一个跳得很高的角色。如果他不是被刺身亡，那么等到“9 1 3”林彪东窗事发，谭的日子肯定是非常难过的，被挂上贼船也未可知。因此，他的被害，对他本人来说，也许还算上天眷顾，得一善终。

再看凶手这边，王自正好像系河南内黄县人氏，当时的传闻是，王家庭出身富农。乃父在河南解放时即被当局镇压，王故而身怀杀父之仇，用菜刀手刃当地村乡干部，而后投军（解放军）南下，来到了云南。直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才发现了这些问题，遂决定审查结束便将其调离昆明，派赴边疆文山军分区保卫科工作。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王血债在身，足见他的案情是非同一般的，那么何以不绳之以法，反而还要继续将他留在军内？而且对他的监管如此放任，以至于他乘夜实施了暗杀大家尚且蒙在鼓里？仅此一端，看来当时为王罗致的罪名就很值得推敲。

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清理阶级队伍清得“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可恰恰就在政府大员自己身边，却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联想到当今社会，很多领导者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如成克杰之在《东方之子》节目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白：广西三千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觉呀，而私底下却和情妇李平几百万几千万地贪。谭甫仁那个年代倒是没听说谁贪污谁腐败的，但领导者把所谓革命理论仅仅当做一种工具，人对己，两种玩法，这荒唐、却非常危险的种子，却早已经播下了。

~~~~~

【研究报告】

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



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本文着重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1）和极左派，并且尝试指出它们各自的政治特点及社会背景。

#### ◇ 老红卫兵：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

“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今天从学术上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划分。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是第一批红卫兵。红卫兵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红卫兵是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学生组织。他们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2）但是他们不仅抨击学校领导，而且不愿听从工作组的指挥。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组织的纲领、成员、行动等，换句话说，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科层制的地方和基层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红卫兵在思想和组织上的这种自主程度违背了共产党对一切群众组织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规方式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基层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虽然支持红卫兵对原学校领导的批判，肯定他们是左派学生，却不能容忍红卫兵组织长期存在（3）。

红卫兵最先在群众运动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着反叛政治权威，在共产党领导下，造谁的反？怎样造反？这是按照常规思路思考问题的工作组和一般学生提出的诘问。此外，红卫兵还提出很多工作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进的主张。

对此，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工作组采取用共青团“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即逐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承认红卫兵的左派学生地位，扶植其中愿意服从领导的人成为工作组领导下的学生领袖，同时要求红卫兵解散他们的组织，放弃过激的口号和行动，和其他学生一道，在工作组领导下，通过班级和共青团组织参加运动。（4）但是红卫兵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接受了工作组提供的共青团分团委委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核心领导小组组员等职务，却坚持自行其是的组织和活动。工作组政策的关键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服从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的领导，而红卫兵执意保持自己的阶级队伍，期待以非同寻常的革命举动建功立业，在学生当中树立权威，他们不那么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听从工作组安排，因而与工作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锐。

红卫兵的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遭到工作组的批评，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种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左派学生组织，提供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冲破党政领导阻力的组织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传达了毛泽东鼓动群众冲破常规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意图。

进一步说，压制红卫兵的方针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肯定红卫兵即意味着对刘少奇的否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泽东得知红卫兵的情况并看过红卫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后，于1966年8月1日，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继而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

从8月1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至8月18日新闻媒介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有半个多月。在此期间，群众中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高级干部子女通过父母的内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为了紧跟毛泽东，也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个别大城市的一批高干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组信任的干部子女，也突然翻脸，抢先对工作组进行批判，这曾使一般群众感到莫明其妙（5）。这些学生的政治表现与红卫兵发动者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在把红卫兵当作“红五类”，实际是干部子女“阶级队伍”的问题上高度认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

#### ◇ 保守派红卫兵：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进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红卫兵创始者遵循的信条，使红卫兵运动呈现出多样性。

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1966年8月，特别是8月18日以后大批出现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及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的红卫兵、武汉市中学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当时是贬义词，他们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大多数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

在红卫兵当中，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的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在学校党委（或党支部）领导运动，以及党委和工作组一道领导运动的地方，维护校领导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学校，党委全体或者部份主要成员在运动开始就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工作组领导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领导、受到工作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的人也被视为保守派，例如在清华大学。（6）保守派一般习惯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的组织体系，不论是党委还是工作组；而“文化大革命”却是一反常规，由党的最高领袖发动和领导，抛开基层党政领导体系，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动群众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基层党政领导，向来天经地义的依靠党组织和紧跟伟大领袖两条原则突然变得不那么一致了。这些党委、工作组培养的左派、积极分子在困惑中常常习惯地偏向前者，因而总是被动，总是“保守”。

应当指出的是，保守派红卫兵也不是维护一切原有秩序。他们往往不仅积极地批判所谓“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和老红卫兵一道参与“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其中一些人还批判学校的行政或党委的次要或主要领导人，这些活动在当时是本校或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或者认可的。

保守派红卫兵和老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异：

1.保守派红卫兵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而老红卫兵不仅批判学校领导而且不愿接受工作组的管束。

2.保守派成员的社会色彩与老红卫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虽然也许不乏干部子女；而老红卫兵则具有引人注目的干部子女色彩。

3.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而保守派只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

4.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而老红卫兵实际上只在北京，并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学，形成强大的派别。因为首先，只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党政中央机关和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居住着这样多的高级领导干部，生活着足以构成强大政治势力的众多干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红卫兵出世之前已经被中央改组，北京市的地方党政领导体系的权威动摇了；再次，老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并不倾向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委，红卫兵的活动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人的理解或赏识。（7）这与其他大城市，如沈阳的红卫兵——“红后代”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没有形成强大的派别，并且始终处于省市党委的保护下，同时维护省市领导，被作为保守派的一部份。

目前在海内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区别保守派和老红卫兵，但是这种区别对于准确把握红卫兵的历史，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支持红卫兵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赞赏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打破现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违拗工作组的行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红卫兵象保守派学生那样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 ◇ 造反派红卫兵：最高领袖指挥的平民子女造反者

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多出现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8），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到1966年底，在大多数城市，造反派已经发展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别。

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大致是具有这样两种经历的人。

1.在运动的最初两个月，被领导运动的党委或工作组批判、冷落，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这些学生被批判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后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著名领袖的，多曾经冒犯党委和工作组的领导权威，他们或者批评学校领导的某些方针政策，或者认为党委、工作组的领导人有政治问题，他们受宣传媒介的影响，常常崇尚群众的自发性，主张比工作组更激进的作法，如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同样被工作组批评，但是他们的处境与老红卫兵迥然不同。老红卫兵被认为是不听指挥的左派。而他们则被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这些敢于向党委和工作组挑战的学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学生因为“白专”、“思想反动”被批判，或者因为“思想落后”、出身问题、表现不积极而受冷落。

2.另一类学生加入造反派是因为受到血统论的歧视和压抑，或者仅仅因为反对血统论。在北京多数中学，造反派起源于对老红卫兵血统论的反抗。在其他地区，如上海、广州，批判血

统论也是中学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学生得到平反，他们组成造反派，攻击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压制过他们的党委、工作组、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运动的锋芒真正指向了党内当权派。应当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这些学生的政治打击和歧视是以左的错误为指导的，理应予以推翻；但是对这种左的错误的批判被导向更加左的错误，文革领导者调动群众的不满，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冲击并残酷无情地整领导干部，导致了全面的动乱和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

#### ◇ 极左派：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

学生中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鉴于学生组织当时被泛称为红卫兵，这里姑且将极左派列入红卫兵运动。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的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9〕新思潮逐渐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极左派”。就目前所知，大致相似的观点和活动在南京、上海、长沙和武汉都出现过。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派划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但是，它在红卫兵运动中有过一定的影响，不可不予以注意。〔10〕

湖南长沙第一中学高中学生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无疑是极左派思潮的代表作和集大成者。文章提出：新中国建立17年以来，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这个“新的官僚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应当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人民公社”。在现实政治问题方面，文章攻击周恩来是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指责革命委员会是妥协的产物，听命于军队和地方官僚；鼓吹造反派向军内走资派夺权，夺取武装等等。〔11〕极左派的其它文献资料部份地、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不难看出，这些文章中称作“极左”的政治观点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公认的1957年右派观点相似，即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予以否定，就这一点而论，它的本质应当是右，文革时谴责极左派是“形左实右”，倒是几分道理。〔12〕“文化大革命”中，“左”和“右”的标签出现了错位。错位的关键是运动的动力和对象的变化，以往运动的领导者——党内“当权派”沦为当时运动的对象，而不受当权派信任的群众成了运动的动力。革命与保守，左派与右派的基准也随之倒置。周恩来严厉地批判了极左思潮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13〕极左派还遭到当时几乎所有自称左派的政治势力的批判。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康生，到溃不成军的老红卫兵、地方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稳健的或激进的造反派，都纷纷出面谴责，虽然各自的立场并非一致。

海外文革研究中，常常见到把造反派和极左派混同，将极左派的言论，如湖南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当作造反派的典型，这至少在学理上是不准确的。极左派从造反派脱胎而来，与造反派比较接近，但是仍然有明显的区别：极左派认为或者倾向认为几乎整个领导阶层构成了官僚特权阶级，而造反派只提出反对某些特权现象、特权人物，观念上只否定走资派，即领导层的少部份人，虽然事实上他们冲击了一大批；极左派反对周恩来，而造反派尊敬周恩来，虽然不是无条件地崇拜，甚至多少有所非议；极左派抨击革命委员会，而当时造反派正为进入革

委会而明争暗斗，甚至打得不可开交；极左派公然不顾中央报刊社论的指导精神，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去阐发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利用毛泽东的观念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造反派的总体倾向是追随并努力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尽力通过紧跟中央的部署，保持自己的利益。文革领导者的政策也说明极左派与造反派的不同。对极左派，“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批判和镇压，而对造反派，则是支持并努力保持对它的控制。极左派从造反派的极端派别中衍生出来，并且能够得到某些造反派激进分子的同情，但是二者的基本倾向不同。造反派的主流是由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各地红卫兵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潮流，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与极左派的距离，并对其持批判态度。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是极左派的代表作，而不是造反派的典型言论，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很清楚，文革研究中也不应混淆。

#### ◇ 斗争方向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红卫兵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类红卫兵对运动的理解、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却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异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旧”运动以及在学生中鼓吹“阶级路线”；老红卫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击教师和学校的领导，“破四旧”主要残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会成员，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资本家，以及其他被认为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人。老红卫兵也批判所谓“黑帮”，即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教育界的领导干部，但是一般地说不是重点。实际上，很多“黑帮”是由党内斗争，经过党的组织被打倒，而不是首先由红卫兵发难的，例如北京市主要领导人。在老红卫兵看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一般说来，老红卫兵斗争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党内，而是指向党外。

老红卫兵鼓吹的所谓“阶级路线”，如风靡一时的一幅对联所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一种血统论。它赤裸裸地显示出干部子女的强烈优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思潮。

老红卫兵虽然打着“红五类”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领袖和骨干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深受父辈革命信念、英雄业绩的熏陶，也从父辈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权力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子女优越的待遇。老红卫兵的政治思潮和行为特点与他们的社会存在直接相关。他们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识、强烈的社会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他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热切地期待“革命”，期待着像长辈一样在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业。然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垄断的、排他的，不愿承认一切同龄人都具有同样的机会和权利。无怪乎造反派讥笑他们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老红卫兵强调歧视性的阶级路线，将红卫兵看作“红五类”的阶级队伍，实际上是以青少年的幼稚，不加掩饰地在同代人中追求特权。理想主义的旗帜包藏着小群体的私利。后来，他们从文革的“闯将”变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者，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这场革命越来越与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打击到了他们引以为自豪和依靠的父辈——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他们自己，危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老红卫兵的抗争在反对迫害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带着强烈的干部子女情结，很少在领导干部和干部子女以外得到同情。由于老红卫兵曾经伤害过许多人，因此，他们的失势在当时被很多学生看作反对迫害、反对特权的胜利成果。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因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而从文革的拥护者变为逍遥派或者反对派，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普遍现象。在老红卫兵之后，这一代青年，包括造反派，大多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虽然促使人们转变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

保守派红卫兵以维护党组织的领导为特征，但是也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与老红卫兵一起参加了“红色恐怖”的“破四旧”活动。这些斗争的锋芒基本指向党外，但同样是残酷地伤害了很多群众。

保守派的骨干多为受党委或者工作组器重、信任的学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较多，团员党员的比例比其他派别高。保守派也强调阶级路线，他们赞赏或者理解老红卫兵提出血统论的愿望，但是认为那幅“对联”的提法不策略，不利于团结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显然，这些人懂得，能够团结别人才是保持领导地位的良方。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1966年8月关于“对联”的大字报和讲话，既维护工作组又策略地赞赏血统论的精神，在保守派中颇有市场，阶级路线和阶级队伍问题上的既得利益，是老红卫兵与保守派合流的一个重要基础。

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原则上，造反派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远不及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事实上，造反派红卫兵兴起以后，曾鼓动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师起来造反，摆脱运动初期工作组的压抑，并且与教师以及知识界的造反派联成一体。造反派和老红卫兵都宣称“造反有理”，但是他们的造反目标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党内，后者主要指向党外。

造反派在获得平反以后，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倾向。一个是热心于党内斗争。造反派批判工作组，进而追究上级党委，直至中央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热衷于揪“走资派”、“叛徒”，区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争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等等。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倾向，著名的大学红卫兵多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倾向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学生首先关心的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带有社会性的家庭出身问题，即对血统论的批判，而不是党内斗争，划分两条路线的问题。他们从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进而触及到对官僚特权的批判。这种倾向并不那么受文革领导者的鼓励，却在深受血统论之害的中学生当中基础广泛。与这种经历相关，红卫兵运动退潮以后，一批学历较低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表现出比“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还要强烈的理论兴趣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

造反派红卫兵强调政治观点而不怎么看重家庭出身，其成员的家庭背景十分广泛，但是以不当权的社会阶层为主，从工农到知识分子，甚至有“剥削阶级”。造反派红卫兵能够响应文革领导者的号召，积极投入批判党政领导干部的活动，不能不说与这样的社会背景有关。

在合法性上，如果说老红卫兵依仗其与领导层的“红色”的血缘关系，保守派红卫兵依赖党政组织，那么造反派则只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以最高领导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

在意识形态方面，造反派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他们更偏爱其中“大民主”、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等内容。他们相信，社会的弊病和不公正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变质，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党的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相信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和群众性的大民主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腐化变质和官僚特权的有效武器等等。他们崇拜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路线的胜利。他们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泽东的理论框架，他们习惯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这后一点是他们与极左派的重要区别。

极左派的批判锋芒对着整个现存制度和领导阶层，同时又运用毛泽东的理论概念表达思想，

因此仍然应当视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下的异端思潮。（14）极左派基本上由激进学生的小团体构成，他们的思想大于行动。目前尚缺乏关于这些学生家庭出身的详细资料，从现有材料看，至少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当时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如杨曦光的父亲是1959年因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错误地批判和贬职的领导干部。

红卫兵各种流派的特质不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会根源，因此通过思想灌输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法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对这一派失望后，转而支持另一派。对老红卫兵，夏天把他们捧上天安门，冬天又将其中坚持己见、阻碍运动的分子抛进监狱。这种政策以及其它严酷的事实最终使大部份青年产生了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直至走出文革的错误。

综上所述，在红卫兵的四个主要政治流派当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充当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流派。（15）二者尖锐对立，但都具有鲜明的政治个性、突出的思想特征，都对社会造成过剧烈的破坏性冲击。与此相比，依赖基层党政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色彩平淡，而极左派提出的问题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注释：

〔1〕造反派，原来指“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特定派别，是狭义的概念。后来泛指运动中一切群众组织或者一切打破既成领导秩序的人，是广义的概念。本文在狭义上使用“造反派”的概念。

〔2〕清华附中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见《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3〕大约1966年6至7月间，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制定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提出：“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织另外自发建立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见《愤怒声讨胡克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编印。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1988年也对笔者谈到这一点。1966年7月14日，刘少奇说：“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段话大概是“消化红卫兵”的政策遇到困难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讲的。见北师大一附中六二0北京公社1967年1月编印：《刘少奇镇压北京师大一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原文注明了大致的资料出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到：“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被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污蔑为‘反动组织’，……”

〔4〕据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1988年对笔者说，“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是邓小平提出，由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领导人胡克实传达的。另有材料说，胡克实指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团组织中来，不能团外有团”。见《愤怒声讨胡克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编印。

〔5〕1966年7月底，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6〕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是率先批判学校领导的学生，因为受到工作组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也被视为保守派。

〔7〕当年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发起人之一，P女士1989年10月对笔者说，在毛泽东支持之前，他们红旗战斗小组得到的信息是，不少上层领导人支持他们。她说，他们受到工作组打击而没有垮，是和这种情况有关系的。曾经被红卫兵冲击的清华附中校长和工作组组长1988年和1989年也曾经对笔者说，他们感到这些干部子女背后有党内更高领导层次某些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

〔8〕个别大胆的造反学生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就成立了组织，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于8月17日，其前身，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得更早。

〔9〕北京市中学生写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运用毛泽东讲话中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概念解释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新思潮的一篇代表性文章。见《四三战报》1967年6月11日。

〔10〕在北京，首都516红卫兵团被作为极左的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目前笔者尚缺乏该组织的原始文献，其核心观点似乎只是反对周恩来，而没有提出其他社会政治问题。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以清查这个组织的名义，进行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也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在上海，上海中学学生写的《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为极左思潮。在长沙，长沙一中“省无联”派的学生杨曦光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极左思潮集大成者。在武汉，有“北、决、扬”派的极左思潮和活动，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中国向何处去？》（1967年1月6日），见：广州《广印红旗》，1968年3月，康生1968年1月24日批判该文的讲话刊载于广州八五公社《八五》编辑部编：《八五》，1968年2月。

〔12〕杨曦光在1986年以笔名“习广”撰文肯定了极左派是“形左实右”这一判断，见：习广：《“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知识分子》杂志，1986年春季号。该文把造反派与极左派混为一谈，似不够准确。

〔13〕周恩来1968年1月24日讲话（摘要），见北京市红卫兵1968年3月10日编印的一份油印批判资料（编辑单位不明）。

〔14〕参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二十一世纪》杂志，1996年8月号。

〔15〕关于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比较，参见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二十一世纪》杂志，1992年10月号。转载于：于辉编：《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 原载《青年研究》（1997年）

~~~~~

【发微探幽】

和“圣人”对话——毛泽东晚年文化心态的一个侧面

• 陈 晋 •



在写下《七律·有所思》不久，“凭阑听雨”的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在白云黄鹤的武昌住所给江青写了封信。该信文辞流畅，一气呵成，颇富个人色彩，还引用了不少典故。当时看过这封信的人只有周恩来和江青，后来被烧掉了，只保存下来一个抄件，由此越发让人觉得这封信有其特别之处。

信中格外引人注目的词句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这些议论，是由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引起的。他在讲话中举了大量古今中外政变的事例，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中国“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然后就鼓吹“天才论”，鼓吹对毛泽东无条件的个人崇拜。显然，前者是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推到了极端，后者是把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条件推到了极端。毛泽东在勉强接受了这些提法以后，不觉有些担心起来。于是才有了上面这些自我解剖之语。这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的心里活动的真实表达，也可以拿来作为刚刚写就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一个注脚。在反思自我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30年前就在他心目中树立起了“圣人”地位的鲁迅。在给江青的信中，他还写道：“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的确，“圣人”鲁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似乎始终是一个判别是非的人格化座标，针贬时弊的精神匕首，分析问题的思路切点和表达观点的语言素材。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搬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这位“圣人”及其作品对话，以求默契的心灵交流。

鲁迅毕竟首先是文学家。在鲁迅的作品中，毛泽东最喜欢他的杂文。在鲁迅的小说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阿Q正传》。关于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他读得并不多，但《阿Q正传》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欢，读得最熟最透的一部现代小说。

就像后来文学界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觉悟的农民要求参加革命党而最终被杀害的悲剧，反映出中国农民自身的弱点及其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联系。“阿Q”，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含义的永恒典型，乃至一种社会精神现象的代名词。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特别了解的毛泽东，对阿Q有特别的体会。

有文字记载的毛泽东最早引用的鲁迅作品，就是这篇小说，就是阿Q。那时鲁迅逝世还不到半年。此后，他谈得最多的鲁迅笔下的文学形像，也是阿Q。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拎出这个人物形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习惯，从延安就开始了。

1939年9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的窑洞里再次见到毛泽东。当斯诺说最近蒋介石的一个谈话显然是否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并问毛泽东怎样看蒋介石的这个观点时，他回答说：“在一小部份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

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意承认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又说：“在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这里，是借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说明抗战时期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欺欺人的心理现象。

1942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说：现在许多作品描写的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对小资产阶级有同情，把自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工农及工农干部有恐惧心理。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是不同的。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而创作的。这里，径直谈到了作者鲁迅对笔下阿Q的情感态度。也表明了毛泽东对阿Q的情感态度。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谈到“治病救人”的问题，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一个好的态度，接着幽默地说：家庭里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再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子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这里，是通过对阿Q性格的分析，来比喻土地革命时期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建国后文化思想界几次“反唯心论的斗争”，又说：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1956年4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十大关系时再次讲：“《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一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两段，是借阿Q谈怎样对待建国后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两次说到《阿Q正传》。

前期，毛泽东曾找各大区书记谈话，说要印发《阿Q正传》，意即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说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后期开始批判彭德怀等人，毛泽东对阿Q形像的引用角度又发生了变化。他在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人总是要给一个出路。我常说阿Q不满意，就是赵太爷不让人家革命。。阿Q的缺点是不能自我批评，自己是癞痢头，不许人家讲，人家一讲，就要打架，又打不赢，又告饶说老子打儿子，不打时又说是儿子打老子。这是鲁迅描写中国不觉悟的劳动人民，但是本质很好。现在条件比那时不同，要把这方面强调一下，不要抹杀同志们好的一面，要两点论，要加以分析。他们有革命的一面。这样，对待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过去犯了错误不得了，现在，天无绝人之路，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之意，因为他们有两面性。

看得出，毛泽东是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从阿Q形像的不同角度来引伸这个文学形像的。一是阿Q自我陶醉以至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法；一是与此相关的自负，即不让别人说自己缺点的自以为是，以及看问题主观教条的毛病；一是要求参加革命的进步的愿望，由此，毛泽东对不准他革命的假洋鬼子的印象特别深刻。

对阿Q这个形像的定位，毛泽东说他是不觉悟的农民，并认为鲁迅对阿Q这种人的态度是同情的。

此后，毛泽东便很少谈到阿Q了。鲁迅的旧体诗和杂文更多地成为了这位诗人政治家的语言素材。1957年春天，当毛泽东大力倡导文化界百花齐放，大胆写作，而文艺界却顾虑重重的时候，他常常说起鲁迅，怀想鲁迅。他说，鲁迅如果还活着的话，大概是文联主席，小说可能是写不动了，杂文肯定是会写的。有些作家谈到杂文难写，一是说空气不正常，人们不敢写，一是说杂文均要短小，很难避免片面性。针对这些顾虑，毛泽东在3月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说到：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鲁迅是会写杂文的。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没有片面性，因为他学会了辩证法。又说：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说，在1957年春天“搬出”鲁迅，旨在贯彻“双百方针”，克服执政党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文学家们以大无畏的精神，直面现实，针贬时弊的话，那么，这以后反复谈论鲁迅的用意就要宽阔得多了。

1958年12月初，毛泽东在武汉观看了广州粤剧演员红线女的演出后，红线女请他写几个字，他题的便是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年底，毛泽东也南下来到了广州，在这里抽空翻阅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一时兴起，便一一批注起来，还写了个借题发挥的“说明”，联想起几十年前鲁迅在广州修改旧作的情景：“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到：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餐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需努力。港台一带，餐蚊尚多，西方世界，餐蚊成阵。”所引鲁迅之语，乃凭记忆而写，略有出入，源出自鲁迅1927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写的文末题记。“餐蚊遥叹，余在广州”却是原话。正是在“餐蚊”二字，引发了毛泽东对现实的联想，不自觉地置换角色，仿佛如鲁迅当年所处身境。接着，又仿效陆游的《七绝·示儿》，作诗明志：“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餐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鲁迅以“餐蚊遥叹”之句来蔑视对手，激发起毛泽东“尽扫餐蚊”实现五洲大同的豪情。其时所指“餐蚊”，显然已非当年围剿鲁迅的敌手，而是海外的一切反华势力了。

作为旧体诗人，毛泽东特别喜欢鲁迅的律绝。他读过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对人说还是鲁迅的旧体诗写得好，能够流传。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鲁迅诗集》，收47题54首作品。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到尾细读过，还留有批画。如鲁迅1931年写的《湘灵歌》中有一句“太平成像盈秋门”，毛泽东随即批注：“从李长吉来”。平时练习书法，也是常常书写鲁迅诗句，还对人说，这样做可以进一步理解鲁迅的作品，理解鲁迅。1959年以后，毛泽东还改写了鲁迅好几首作品。因“餐蚊”之想，仿作《示儿》一年后，他在杭州便依据鲁迅写于1935年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写了一首《改鲁迅》：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其中，后四句改动最大。原诗后四句为“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悚听荒鸡偏（门鼻）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是鲁迅生前写的最后一首旧体诗。据他的老朋友许寿裳讲，其意在“哀民生之憔悴，壮心事之浩茫。……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声入心通的毛泽东，拿来鲁迅寓苦斗益坚于寂寞自嘲的斗争方法，调侃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心目中的“餐蚊”——现代修正主义。改写的后四句，显然指当时一心要同美国缓和关系的赫鲁晓夫。尽管赫鲁晓夫认为自己所作“皆圣绩”，但毛泽东却提出帝国主义的气焰正当“阑干”之时，攀龙附凤之举，最终会“苦坠空云”般心寒意凉失望万分的。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精神的根本内容，不仅是在孤寂中坚忍苦斗，还在于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这一点，对60年代面临“敌焰阑干”的国内外人民来说，似乎特别有效法作用。1961年10月7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对来宾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说完，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又特意嘱咐陪见的郭沫若帮助翻译成日文。

1961年，正好是鲁迅诞辰80周年。小鲁迅12岁的毛泽东自然记得很清楚。读鲁迅诗，品其人，他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前一首选取1931年2月鲁迅为纪念在上海龙华被害的包括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在内的23名革命青年作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和《七律·无题》的情景，称颂鲁迅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的韧性战斗风格。《为了忘却的纪念》里说：“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他的“积习”，就是以笔为旗的抗争。除了这篇杂文外，鲁迅当即写的《七律·无题》里有句云：“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是浙江绍兴（古称山阴）人，历史上人文荟萃，多雄杰名士。在第二首诗里，毛泽东由鲁迅而联想到留有《剑南诗稿》的绍兴人陆游，和辛亥革命志士、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毛泽东认为，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都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崇高热忱和气节。

鲁迅晚年的杂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晚年的毛泽东潜心阅读的现当代作家作品，也只有鲁迅的杂文。他要人们学习和研究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所获得的启发是：鲁迅“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他临死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去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个观点，毛泽东接着历数鲁迅许多杂文集书名的来历：“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了《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鲁迅杂文的写作和集纳的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是何等熟悉的了。

或许是由于性格上的天然相通，毛泽东有时候也径直采用鲁迅的战斗方法。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有人谈到某外国元首骂我们，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则说：写一篇老而不死论。鲁迅写过。许多人围攻他，他就不屈服，从来没有屈服。他又没

有我们这么多人开会。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时候的形势，看他的作战方法。

晚年毛泽东似乎总觉得，六七十年代的国内外局势与二三十年代的环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他念念不忘鲁迅、一意“搬出”鲁迅的一个潜在因素。但对一般人来说，要读懂鲁迅并非易事，特别是像他那样去体会鲁迅的精神人格、阐发其作品意义的人更少。对此，毛泽东也有所察觉，逐渐流露出一些不满来。他先是讲过要搞一个鲁迅的语录出来，意在普及，但此事没有搞起来。1971年11月在武汉视察途中，又提起话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的书不大好读，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要党内干部普遍地反复地去读鲁迅的杂文，并不是很现实的事。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和鲁迅研究专家们才有可能和兴趣去这样做。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种是1938年出的20卷本，一种是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上面都留下了不少批画，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字。1972年，他又特意让有关部门把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排印成线装大字本。在迟暮之年，抱老病之躯，负眼疾之患，硬是把这套线装大字本又读了一遍，在上面画了不少圈圈、道道。在有的封面上，握笔写下这样几个字——“1975.8再读”。

而这个时候，中国政坛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直接看出它同毛泽东读鲁迅杂文的联系。一件是1975年8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水浒》的谈话。进而被“四人帮”一伙利用，搞起“批投降派”、评《水浒》运动。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接引用了鲁迅《三闲集》中《流氓的变迁》一文的话：“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还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另一件事情是，这个时候，邓小平主持党政军的工作，在大力阔斧的整顿中，起用了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自然就引起了“文化大革命”新贵们的非议。由于刚刚动过眼睛手术，毛泽东则专门让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准风月谈》里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批评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把整个苹果扔掉的做法，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想是错误的时候，他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鲁迅，这位以笔为戈奋斗一生的文人，为什么在毛泽东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革命家的心目中占有如此显著的地位？这是个饶有兴味却颇为复杂的问题。我想，说其大要，大概有这样几层原因：鲁迅本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的独特贡献；鲁迅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情和理解；他们两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的相通共鸣……

当然还有一层性格上的原因。当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人格理想，诸如反迷信、反权威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在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中，都从不屈服的敢于应战和挑战的气概；对国民性弱点的冷静提示，对新人格气象的热情渴求；以及坚定相信未来、相信青年的旷远胸怀。

载着毛泽东和中国的历史之舟，已经远离鲁迅的时代。但是，在夺得天下，全国人民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和在中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孤独奋斗的鲁迅息息相通。这是很让人深思的事情。大凡伟人，在身处现实，洞悉世事的基础上，都多少有些环顾四周而少知音的忧虑和孤独，没有这种出众之处，也就无所谓“伟”了。鲁迅的孤独感，从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特别是那个在天地间独来独往，只知朝前面行走的“过客”），以及思绪深邃、艰涩超拔的大量杂文中，不难体会得到。而晚年毛泽东则常常叹惋：党内真正

懂得马列的人太少（不是共产党员的鲁迅，则被他视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他经常采取的步骤，也不是大多数人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在1966年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引用古人的话，说“世无英雄，让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阳春白雪，和者皆寡”……，这多少就是对不可言状的孤独心境的透露。

如此一来，两位伫立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人物，仿佛是站在不同的峰巅上，遥遥相望却心心相印，而对毛泽东来说，在鲁迅已逝去多年，在山头上很少看见别的东西的时候，只有同鲁迅的遗著对话了。在对话中，越发感到鲁迅的伟岸超拔。正是1971年11月在武汉那次谈论鲁迅的时候，他重申了自己1937年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时所做的结论：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万岁”声中，毛泽东竟说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肯定令听者匪夷所思，莫名惊吒，或者只是那么一听而过，不会当真。是啊，谁能去理解他呢？谁能真正沉浸下来去体会他愿做鲁迅这位“中国第一圣人”的学生的心境呢？其实，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读懂了毛泽东的这个“圣人”之论，也很不容易体会到其中的真谛。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逝世前半年多的时候，还郑重地发布指示：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在1976年9月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和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放着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上折上了一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是翻开放着的……

□ 原载北京《党史研究》（1997）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